九州大学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Kyushu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羌酋董氏與唐代劍南道西山地域 : 以新出《董嘉猷妻郭氏墓誌》爲線索

周, 鼎
華東師範大学

https://doi.org/10.15017/1657930

出版情報：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 44, pp.1-25, 2016-03-31. 九州大学文学部東洋史研究会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KYUSHU UNIVERSITY

羌酋董氏與唐代劍南道西山地域
— 以新出《董嘉猷妻郭氏墓誌》爲線索 —

周　　鼎

一　引言

在考察四川地區早期發展史的諸多論著中，研究者普遍注意到廣泛分佈其間的以夷、獠爲代表的非漢族群[1]。可以說，在漢唐間四川地區的發展進程中，中央王朝（或割據政權）一直不斷致力推進郡縣支配體系，而非漢族群則被逐漸征服進而實現編戶化[2]。

在今四川境內的諸多非漢民族中，有一支在唐代被稱爲“西山諸羌”[3]的人群顯得尤爲特殊。相較於夷、獠等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已非常活躍的族群，西山諸羌的活動主要集中在隋唐時期，據兩《唐書》等文獻記載，他們曾建立過部落聯合體性質的政權，即所謂“東女國”，或稱“西山八國”。圍繞西山諸羌的來源、族屬、地望等問題，山口瑞鳳[4]、佐藤長[5]、李紹明[6]、郭聲波[7]等學者續有論考，一些羌族史專書也辟有專門章節做過論述[8]。然而囿於史料，迄今爲止對這一族群的認知尚有一些不甚明瞭之處，另外，先行研究中對西山諸羌內部的權力結構及與唐代西南邊防體系的關係等問題也鮮有觸及。

近年西安出土了一方唐《董嘉猷妻郭氏墓誌》，爲我們瞭解西山諸羌尤其是其首領家族的動向提供了新的線索。下文擬先介紹這方墓誌的概況，進而結合其他文獻，圍繞西山諸羌中董氏一支的族屬及其在西山地區的活動等展開考察，希望能提供一則呈現中古時期邊境地帶族群、地域社會與國家互動關係的個案，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推進對有關問題的認知。

二　墓誌概況與錄文

《董嘉猷妻郭氏墓誌》首題全文為“唐故試將作少監兼恭州刺史董府君妻太原郭氏墓誌銘一首并序”，誌石長、寬均爲55釐米，誌文計27行，滿行27字，近年西安市長安區郭杜鎮附近出土，2012年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館，此後《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續編》（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一書收入了其拓片與錄文。今據書中所附拓片錄文如下（下劃線爲筆者所加）：

【錄文】

唐故試將作少監兼恭州刺史董府君妻太原郭氏墓誌銘一首并序

守尚書吏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河東裴次元　撰

夫人姓郭氏，其先太原人也。皇朝蒲州桑泉縣令諱岳，夫人曾祖/也。桑泉生仙舟，皇朝散大夫、蒲州猗氏縣令。猗氏生皇中大夫試大理/少卿侹。夫人則大理第六女也。世以踐履仁義、纂修文德，大王父射策高第，/振藻於當時。自薛而出，夫人即隨內史道衡之後。河東著氏，輝灼於天/下。合二姓之華胄，爲一時之茂族。而慶未顯嗣，延美於夫人。夫人幼而/惠悟，光乎內則；女也儀德，彰於弱年。及笄有行，適於董氏。董則非敵，有/爲而歸之。諒以夫人既孤，育於慈親，昆弟之祿未及榮養，鍾愛則厚，終/寠且貧。董氏之先，西南蠻之胤也。開元中萬方來庭，納子爲質。質之末/孫，夫人之伉儷也。董君名嘉猷，官至恭州刺史，履道知方，處身寡悔，自/服冠冕，代受恩賜，榮寵湛渥，藉爲豪家。每求外姻，必採名族，特潤屋/之資用，納清門之婚媾。夫人遵孀母之命，移天董宗。雖知非吾偶，藉抑/不樂，而儀則趣尚，亦遷所從。董君祇命題輿，捐謝官次，歸葬一紀，楸松/拱成。夫人心靈智度，實邁常品，使爲男子，必顯良才；若歸賢人，必表徽範。/無何嬰疾，踰時不瘳，以貞元廿年正月二日終延壽里第，享年五十。

悲/夫，其生也致心不適，其歿也當室無孤。主喪捧奠，寄於賤餘，可勝言耶！/夫人將啓手足，顧後靡託，乃嘆曰：“禮有合祔，疇職其儀。庭內既愉於他/人，窀穸豈煩於同穴？”有青衣順意者，實承其命焉。泊（洎？）灼龜叶辰，來白余曰：/“將遷夫人靈座，以其年十月十三日歸葬於長安縣義陽鄉宋滿村之/南原。從權遵命也。懼深谷之位陵，求立言以刊石。”余以中外懿戚，欲讓/不能，爰採見聞，誌乎泉壤。其詞曰（後略）

三　從“西羌”到“西南蠻”：董氏的族屬

（1）“西羌”董氏及其源流

上引誌文中對郭氏之夫董嘉猷的家世有如下記敘：“董氏之先，西南蠻之胤也。開元中萬方來庭，納子爲質。質之末孫，夫人之伉儷也。”其中所言“西南蠻”具體族屬爲何呢？與本文要討論的西山諸羌有何關聯？要回答上述問題須從其姓氏與所任恭州刺史一職入手。

恭州位於劍南道西北部，開元二十四年（736）“析靜州部落於柘州西置”(9)，正是文獻所見西山諸羌的主要活動區域。恭州之外，自武德年間以來唐政府在西山地區還設置了一系列的州縣(10)，我們注意的是如下一些記載，《舊唐書》卷四一《地理志》維州條：

> 武德元年，白苟羌降服，乃於姜維故城置維州，領金川、定廉二縣。貞觀元年，羌叛，州縣俱罷。二年，生羌首領董屈占者，請吏復立維州，移治於姜維城東，始屬茂州，爲羈縻州。
>
> 小封（縣）　咸亨二年，刺史董弄招慰生羌置也。

《舊唐書》同卷徹州條：

> 貞觀五年，西羌首領董凋貞歸化置。

《舊唐書》同卷當州條：

本松州之通軌縣。貞觀二十一年、析置當州。通軌，本屬松州，歷代生羌之地。貞觀二十年，松州首領董和那蓬固守松府，特敕於通軌縣置當州，以蓬爲刺史。顯慶元年，蓬嫡子屈寧襲繼爲刺史。

《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蓬魯州條：

永徽二年，特浪生羌董悉奉求、辟惠生羌卜檐莫等種落萬餘戶內附，又析置州三十二。

《舊唐書》卷四一《地理志》悉州條：

顯慶元年，生羌首領董系比射內附，乃於地置悉州，州在悉當川故也。以董系比射爲刺史，領左封、歸誠二縣。載初元年，又移州理東南五十里匪平川置也。

《舊唐書》同卷保州條：

本維州之定廉縣。開元二十八年，置奉州，以董晏立爲刺史，領定廉一縣。天寶元年，改爲雲山郡。八載，移治所於天保軍，乃改爲天保郡。乾元元年二月，西山子弟兵馬使嗣歸誠王董嘉俊以西山管內天保郡歸附，乃爲保州，以嘉俊爲刺史。

以上州縣均是唐初至安史之亂前後在西山地區陸續創設的，其刺史、令長則往往由歸附的西羌首領家族世襲。在這類記載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董姓首領的活動，如維州的董屈占與董弄、徹州的董凋貞、松州的董和那蓬父子、悉州的董系比射、奉州的董晏立、保州的董嘉俊等。

雖然僅憑以上史料很難判定他們彼此間的親屬關係，但毫無疑問，董姓諸人應該是羌族部落中一支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群。杜甫在《東西兩川說》中分析西山局勢時曾有如下一段常被研究者所忽略的議論：

比羌俗封王者，初以拔城之功得，今城失矣，襲王如故，總統未已，奈諸董攘臂何？王尹之獄是矣。由策嗣羌王，關王氏舊親，西董族最

高，怨望之勢然矣。(11)

這段史料涉及到西山諸羌部族間的矛盾，對此後文還要專門分析。我們首先關注的是，杜甫明確指出在羌酋家族中“西董族最高”，由此可見董氏屬於西山諸羌中的大姓豪族。那麼，西山諸羌中“諸董”爲何會被稱爲“西董”並被認爲“族最高”呢？對此，諸家注杜者多語焉不詳。筆者認爲，這段話隱約透露出董氏族屬源流的重要信息。

在位於西山地區西北部的吐蕃東北境有一個被稱爲“多彌”的西羌小國，《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域傳下》對其有一段專門記載：

多彌，亦西羌族，役屬吐蕃，號難磨。濱犁牛河，土多黃金。貞觀六年遣使朝貢，賜遣之。

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周偉洲等學者根據敦煌出土的吐蕃紀年史書推測，“多彌”即藏語LDong mi之音譯，而LDong是指傳說中吐蕃早期六部族之一的董族（sDong），“LDong mi”意爲“董族之人”。此外，周偉洲先生還指出，“多彌”又作“當迷”、“彌多彌”，即天寶年間與東女國、白狗羌等部共同歸順的“南國”（即難磨）(12)。當然，由於涉及到對古藏文的不同釋讀，上述觀點也並非定論，精研古藏語及吐蕃早期發展史的山口瑞鳳對此還提出過另外一種不同解釋。敦煌文書P.1288《大事記年》：

及至牛年（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於多思麻，甘·墀桑爲仇敵（thong myis）所殺，從而復仇也。(13)

文中出現的thong myis一詞，王堯先生譯作“仇敵”，而山口瑞鳳則認爲是漢文史料中“多彌”之對音，“多彌”係由thong（山口氏轉寫作“Thon”）與myis兩大族群組成的部落聯合體，其中的thong即董氏，他們與唐代的東女國存在某種關聯(14)。

筆者不通藏文，自然無法判定上述兩說何者爲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外學者根據各自獨立研究的結果均顯示：作爲吐蕃屬國的多彌，其族姓漢

譯爲“董”或“西董”，其地理位置位於吐蕃東北境，與東女國相鄰，且曾共同遣使歸唐。而如上所述，毗鄰吐蕃東境的西山地區同樣活躍着一群董姓羌酋。考慮到西山諸羌中原本即有不少從河湟地區遷入[15]，而岷江上游也夙有溝通西域與巴蜀的“南北孔道”之稱[16]，因此不妨推測，西山諸羌中的董姓豪酋應是從西北部的多彌遷徙而來。從源頭上說，他們與吐蕃早期部族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聯繫，甚至可能同源，也正因此，吐蕃歷史文獻中才會記載他們的活動。他們被深諳西山內情的杜甫稱爲“西董”（sDong）[17]并認爲其“族最高”，也可以從中得到合理的解釋。

（2）“西南蠻”董氏

如果以上分析不誤，董氏屬於“西山諸羌”中的一支，源出吐蕃轄下的西羌多彌部，那麼爲什麼墓誌中又稱其爲“西南蠻”呢？首先可以肯定，這並非墓誌作者的誤解，因爲依據唐代官修國史編撰而成的《舊唐書》便明確將東女國爲代表的西山諸羌列入《西南蠻傳》，而同時又稱其爲“西羌之別種”[18]。這顯然代表着當時的某種官方認知。如所周知，“蠻（夷）”與“羌（戎）”分別是古代文獻中對南方與西方兩類非漢族群的稱謂，在漢代及魏晉南北朝時期其各自的指代人群也是基本清晰的[19]，爲什麼唐代官方認知中會將兩者混爲一談呢？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恐怕需要對漢唐間西南地區的民族遷徙與融合情況做出通盤性考察，這不是一篇專題論文所能勝任的，因此下面只擬以董氏爲例，嘗試對這個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西南蠻中的董氏並非於史無稽，在文獻中確實能找到一些例證。《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蠻傳》：

> 松外蠻尚數十百部，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凡數十姓，趙、楊、李、董爲貴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長。有城郭、文字，頗知陰

陽曆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莊蹻之裔。有稻、麥、粟、豆、絲、麻、薤、蒜、桃、李。以十二月爲歲首。……貞觀中，巂州都督劉伯英上疏：“松外諸蠻，率暫附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居數歲，太宗以右武侯將軍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進討，……建方諭降者七十餘部，戶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爲縣令，余眾感悅。

以上這段文字又見於《通典》卷一八七、《冊府元龜》卷九六〇，據今人考證，當是貞觀年間親征松外蠻的梁建方所記，方國瑜等將其定名爲《西洱河風土記》[20]。在對劍南道南部松外蠻的記載中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松外蠻有“七十餘部，戶十萬九千”，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人口數，幾乎與當時整個益州的編戶數相當[21]。顯然，“松外蠻”不是一個單一的民族，而是對松外地區諸部族的泛稱，其構成族群非常複雜，《通典》等文獻徑稱之爲“松外諸蠻”，更近其實[22]。其二、松外蠻“貴族”四姓中的趙、楊、李，一般被認爲是後世大理國白蠻諸姓。然而董姓卻並不見於白蠻姓氏，如上文所考，是非漢民族中的西羌大姓。另外，趙、楊二姓在唐代西羌首領中其實也可見其例，《冊府元龜》卷九六五《外臣部· 冊封》：“唐玄宗天寶元年正月，封女國王趙曳夫爲歸昌王，授左金吾衛大將軍，……喃國王楊多過爲懷寧王，授左羽林軍大將軍，並員外置，各賜帛八十疋，放還部落。” 其中的女國即西山東女國，喃國即多彌國，都是羌系民族[23]。從以上兩點來看，松外蠻諸部中似乎有部份也是源自羌人。

關於董姓人群在西南蠻中的分佈，《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南蠻傳》中還提供了一些線索：

永徽初，大勃弄楊承顛私署將帥，寇麻州。……高宗以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爲郎州道行軍總管，……孝祖按軍，多棄城，逐北至周近水，大酋儉彌于、鬼主董樸濱水爲柵……

戎州管內有馴、騁、浪三州大鬼主董嘉慶，累世內附，以忠謹稱，

封歸義郡王。貞元中，狼蠻亦請內附，……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檄嘉慶兼押狼蠻。……姚州境有永昌蠻，居古永昌郡地。咸亨五年叛，高宗以太子右衛副率梁積壽爲姚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武后天授中，遣御史裴懷古招懷。至長壽時，大首領董期率部落二萬內屬。

在上述幾條關於西南蠻首領的記載中，永徽年間郎州境內的鬼主，長壽年間姚州境內的永昌蠻大首領以及貞元年間戎州境內的大鬼主均是董姓。所謂“鬼主”，據《新唐書》中的解釋：“夷人尚鬼，謂主祭者爲鬼主，每歲戶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以復仇云。”而尚鬼之俗正是見於上古以來文獻的典型羌人習俗，上引史料中的“鬼主”一語，按饒宗頤先生意見，即近世北川羌人部落中被稱爲“端公”的巫師[24]。這一信息提示我們，西南蠻中的某些部族與羌人存在很深的文化淵源。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爲馴、騁、浪三州大鬼主的董嘉慶。我們發現，他與可判定爲西山諸羌的董嘉猷、董嘉俊、董嘉榮、董嘉會等人制名極爲相似[25]，且生活時代相近，大抵都在肅宗乾元至德宗貞元年間。如果將這些信息連綴起來，再結合上文的分析，我想這就不是偶然了，不妨推測以上董氏諸人都是枝屬較近的同族甚或兄弟，而生活在戎州境內的董嘉慶先世很有可能從西山地區遷徙而來。如果這一推斷不誤，則可以證明彼時的西南蠻部落中確實混雜了不少羌人，像董氏這類西羌大姓甚至成爲西南蠻部族的首領（鬼主）。

（3）“羌蠻混雜”與唐宋之際對羌認知的嬗變

這種羌、蠻彼此混雜的態勢在其他史料中也有一些反映，如貞元年間的符載在描述蜀中風俗時稱：“岩岩西蜀，古稱天府之奧也。江山數千里，羌蠻萬餘落，歲時風俗豪侈。”[26]《太平寰宇記》中記載雅州附近交通情況

：“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沿空，不知里數。”[27]凡此種種都說明了中唐以降四川地區羌、蠻兩類人群彼此間呈現出融合的態勢。

“羌蠻混雜”的態勢深深影響了唐宋時期史書編撰者的觀念，對此，王明珂先生有一段宏觀性的論述：

> 過去以“羌”這個異族概念作爲劃分的華夏西方族群邊界，……（唐代以降）逐漸被“番”這個更嚴格的異族概念所取代。除了“番化”之外，另外兩種情況也使得“羌人地帶”在唐代以後日漸萎縮。一是，此地帶上部份人群的完全“漢化”；一是，此地南部人群的“夷化”。……在宋代，“蠻夷”與“羌”成爲中國人心目中西南、西部兩大異族類別。兩大範疇之交疊處，便在岷江上游一帶。……此時官方書寫者觀念中的“西南蠻夷”往北可包括岷江上游茂州、威州等地的非漢住民。[28]

王氏指出唐宋之際對“羌”認知觀念出現了一次重大的變動，觀念變遷的背後是吐蕃、党項等部族的崛起，以及羌、蠻融合的社會現實。關於前一點可姑置不論，但就羌的“蠻（夷）化”而言，董氏諸人的事蹟恰爲此提供了一則典型個案，而根據《董嘉猷妻郭氏墓誌》，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將這一觀念轉變的節點設定在安史之亂後的中唐時期。

另外，對西山羌人認知概念轉變的原因中還有一點也很關鍵，那就是西山地區在王朝邊疆治理體系統中所處位置的變化。我們知道，歷代王朝對邊疆異族的情報搜集，很大一部份都是由其所屬邊疆管理機構提供，這些材料之後又成爲史書的取材對象，在建立了成熟的官方修史機制的唐、宋兩朝尤其如此[29]。這樣一種取材機制無疑會對官修史書中《四夷志》的書寫與編排產生直接影響。

唐宋史書中“以蠻稱羌”的現象也應置於這樣一種脈絡中予以考慮。我們知道，在貞觀年間的十道建制中，岷江上游地區有很大一部份原屬隴右

道，至高宗永徽中才隨松州都督府改隸劍南道[30]，而“西山”這一地理概念也是在此之後才頻見於文獻[31]，這顯然是以劍南道首府成都爲基準的新稱謂。由此，原本隸屬隴右道的西山羌人也全部轉歸劍南道管轄。此後尤其在唐後期，我們看到文獻中對東女等國的集中記載都與劍南道節度使的奏報直接相關。這一情形一直延續到宋代，史書所見董氏豪酋（宋代稱之爲“保霸二州蠻”、“靜州蠻”）的信息同樣大多來自宋初西川安撫使及此後成都府等行政機構的奏報[32]。在唐、宋兩朝領土版圖中，將岷江上游西山地區視爲西南似稍顯勉強，但作爲其所屬行政區劃的劍南一道（成都府）則確實地處西南一隅，而其所轄疆土在中央政府及一般士人眼中自然也就成了西南邊疆。明乎此，董氏等西羌首領在官修史書中被編入《西南蠻》、《蠻夷》等傳就不難理解了。

簡言之，在唐宋兩代的歷史敘述中，岷江上游西山地區的羌人逐漸被視爲西南蠻，而這一觀念變動的背後既有“羌蠻混雜”進而融合的社會現實，也與其統領機構的變動及官修史書《四夷傳》的取材機制存在着複雜而深刻的聯動關係。在諸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董氏的族屬在官方認知中發生了從羌到蠻的轉變。

四　董氏與劍南道防禦體系的變遷

吐蕃王朝自公元六世紀興起於青藏高原後，對中原王朝的邊疆格局產生了一系列深遠的影響，其中之一便是處在唐、蕃之間的西山地域在邊疆防禦體系中的地位日趨凸顯，史稱：“劍南西山又與吐蕃、氐、羌鄰接，武德以來開置州縣，立軍防，即漢之笮路。”[33]可見自唐初以來西山地區便已被納入邊疆軍事體系中。

關於西山諸羌與唐代劍南道邊疆防禦體系的關係，佐竹靖彥曾做過初

步考察，他指出以羌人爲代表的異族兵先後經歷了開元年間的“鎮防團結兵”及其後“西山子弟”、“邊雄子弟”、“壇丁”等階段，始終是唐對吐蕃、南詔戰爭中的重要軍事力量(34)。此外，村井恭子的研究表明，唐代對邊疆民族的統馭手段，以玄宗時代爲界，經歷了一個從羈縻體制到押蕃使體制的轉變歷程，與之相應，貞元年间劍南道也設置了“押近界羌蠻及西山八國使”以統馭西山諸羌(35)。那麽，具體來說，西山羌人部落是怎樣轉化爲唐王朝西南邊防中的軍事力量的呢？從羈縻體制到押蕃使體制的具體建立過程又是如何的？董氏等西羌首領在其中起到了什麽樣的作用？考察上述問題時，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無疑是個關鍵性時期，對此，《董嘉猷妻郭氏墓誌》同樣提供了重要線索。

（1）玄宗時代對西山諸羌控御的強化

如前所述，唐初以來因西羌歸附唐王朝在西山地區建立了一系列的州縣，並以董氏等西羌首領世襲本州刺史。應該說這屬於唐前期邊疆羈縻政策的一環。然而這一政策的效用在西山地區似乎是有限的，據《舊唐書》卷一九七《東女國傳》：

> 其（西羌）部落代襲刺史等官，然亦潛通吐蕃，故謂之“兩面羌”。

這說明，處在唐、蕃之間的西山諸羌一方面接受唐朝的官爵，另一方面也向吐蕃稱臣。囿於官修史書的立場，傳世文獻中很少能見到西羌首領叛唐投蕃的記載，但在董氏諸羌曾中，賴偶然留存下來的石刻史料，我們確實找到了此類事例，《同治理蕃廳志》卷六《志存》：

> 樸頭山石壁鐫云：“朝散大夫檢校維州刺史上柱國焦淑，爲吐蕃賊侯壩並董敦義投蕃，聚結逆徒數千騎，淑領羌漢兵及健兒等三千餘人討除，其賊應時敗散。開元十五年九月十九日記、典施恩書。”

以上是今四川省阿壩州理縣境內發現的一處唐代摩崖石刻。其中提到的董敦義從姓氏來看應該是羌人，他能聚集“逆徒數千騎”，顯然屬於當地的羌人首領[36]。在此我們看到，董氏羌酋中既有陸續歸順唐朝的，也有在吐蕃方面招誘下叛唐歸蕃的，他們實際採取的是一種因時制宜、靈活多變的政治立場，稱之爲“兩面羌”也正因此。

在唐與吐蕃展開拉鋸戰的大背景之下，叛服無常的羌人首領顯然不利於邊疆形勢的穩定。也正因此，唐中央對西山地區消極的羈縻政策在開元後期開始發生轉變。對此《董嘉猷妻郭氏墓誌》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 開元中萬方來庭，納子爲質。質之末孫，夫人之伉儷也。董君名嘉猷，官至恭州刺史，履道知方，處身寡悔。自服冠冕，代受恩賜，榮寵湛渥，爵爲豪家。

如前所述，恭州創置於開元二十四年，所謂“開元中”應該就是這個時間點。從墓誌透露的信息來看，唐王朝此時很可能是因新州之置，順勢要求董氏“納子爲質”，即要求羌酋將子弟送至長安監視居住，目的顯然是以此來加強對西山地區羌族首領的控制。這應該是有鑒於此前他們“潛通吐蕃”、首鼠兩端的政治立場。相比於唐初以來單純設置州縣來安置羌酋的羈縻政策，此時採取了更爲積極、主動的策略來統馭西山地區。

上述墓誌中反映的跡象並非偶然，與之相應還可以看到一系列對西山諸羌的措置，而唐玄宗個人的作用在其間也扮演了關鍵性角色。首先是中央政府乃至皇帝本人開始直接干預西山諸州的內部事務，據張九齡所擬《敕當州別駕董懲運書》：

> 敕當州別駕董懲運：省所奏王昱及嚴正誨表，具知所緣。卿父往在當州，連年縱酒，既加風疹，行事乖疏。董念封經使具論，王昱始奏停廢，皆憑實狀，不是冤誣。後自病亡，豈可怨訴？所言不直，欲信無憑。卿久襲冠帶，復拘法式，寧不知此，猶且有詞？至於卿身，

合承刺史，比來未授，亦則有由，聞卿少年，未閑撫字，舉州之眾，交藉綏懷，若蕃部不安，豈虛此位？卿若能自勵，從此改修，父亡子及，終不失舊。(37)

以上是開元二十三年前後的一封敕書，其中提到的當州係西山諸州之一，據前引《舊唐書・地理志》:“歷代生羌之地。貞觀二十年，松州首領董和那蓬固守松府，特敕於通軌縣置當州，以蓬爲刺史。”此後其子屈寧也承襲了刺史。敕文中的董懲運父子應該就是董和那蓬的後裔，當州刺史一職例由他們家族世襲。然而在開元年間這一慣例發生了改變，首先是董懲運之父“連年縱酒，既加風疹，行事乖疏”，不能勝任刺史之職，遭到罷免。此後董懲運又上疏爲父鳴屈并要求承襲刺史，但玄宗以其年幼爲由予以拒絕，但同時又勉勵他：“若能自勵、從此改修，父亡子及，終不失舊。”以這種恩威並施的手法，玄宗直接介入西山諸州的刺史任免，這樣一來就動搖了羌酋家族依例世襲的傳統。從玄宗的角度來看，刺史的選任首先強調他們對唐王朝的忠誠，此外也要求羌酋自身具備一定的能力，這與此前消極、被動的羈縻政策區別顯然。在此我們同樣看到的是中央政府對西山諸州控御的加強。

除了強化世襲刺史的任免權外，玄宗甚至還一度直接策劃、指揮了西山地區的軍事行動。《舊唐書》卷一九六上《吐蕃傳》:

（開元）二十八年春，（益州長史章仇）兼瓊密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宴等通謀，都局等遂翻城歸款，因引官軍入城，盡殺吐蕃將士，使監察御史許遠率兵鎮守。上聞之甚悅。中書令李林甫等上表曰：“伏以吐蕃此城，正當衝要，憑險自固，恃以窺邊。……陛下親紆秘策，不興師旅，頃令中使李思敬曉喻羌族，莫不懷恩，翻然改圖，自相謀陷……。”手制答曰：“此城儀鳳年中羌引吐蕃，遂被固守，歲月既久，攻伐亦多。其地險阻，非力所制。朝廷群議，不合取之。朕以小蕃無事須處置，授以奇計，所以行之，護彼戎心，歸我

城守，有足爲慰也。”

安戎城地當要衝，自武后儀鳳年間始便被吐蕃所佔據。爲收復這一軍事要地，唐玄宗“親紆秘策”，“令中使李思敬曉喻羌族”，實施誘降政策，最終，唐軍在內應的幫助下成功攻佔這一西南要塞。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羌族”應該就是指董承宴，他憑此役之功獲得了維州別駕一職。在開元二十八年的這次軍事行動中，從謀劃到具體實施都是由玄宗本人一手操盤，這在此前是不可想象的。由此也可見，開元末期，隨着西山地區戰略位置的凸顯，唐王朝對該地區的控御也空前強化，甚至出現了皇帝定策禁中、直接經略西山事務的局面。而對董氏等西羌首領，一方面，如上所述，不斷加強控制；另一方面，如本則事例所見，實際也在積極拉攏。

（2）藩鎮體制下西山“羌漢協同作戰機制”

與上述政策轉變差不多同時，作爲西南邊防大軍區的劍南道節度使體制也臻於成熟，劍南道領內原有諸軍、鎮、守捉也被整合進入制節度使體制之下。在這一趨勢下，我們發現西山地區的軍鎮配置情況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動向。《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條：

> 黎・雅・邛・翼・茂五州有鎮防團結兵。【原注】：並令刺史自押領，若須防遏，即以上佐及武官充。
>
> ……其六曰劍南節度使，其統有昆明軍、松州・當州防禦、邛郲守捉、姚・巂州經略四使屬焉。

以上這條材料反映的是開元二十五年以前劍南道的主要軍事配置情況，其中直接設於西山地區的有翼州鎮防團結兵、茂州鎮防團結兵、松當州防禦使等三處。然而從開元末至天寶初，短短數年間，劍南一道的軍事配置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日野開三郎曾製表比較過《唐六典》與其他文獻中所記天寶年

間的情況[38]，今稍作修訂[39]，轉引如下：

	唐六典	資治通鑑 舊唐書 通典	軍鎮所在
	昆明軍 姚嶲經略使	同 姚州	嶲州
		寧遠軍 澄川守捉 南江軍 松州、當州	姚州 姚州 姚州
合計九	邛峽守捉 翼州團結 茂州團結 黎州團結 雅州團結 邛州團結	翼州 翼州 茂州 黎州 雅州 邛州 成都團結	
一七	天寶軍 平戎軍 維州 柘州 悉州		恭州 恭州

由於文獻舛訛，相互抵牾之處甚多，且時有廢置，上表所統計的天寶年間的軍鎮數可能不盡準確。然而即便如此也能看出，相比開元時期，天寶年間劍南道的軍鎮配置顯著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其間增置者有半數以上都是出現在西山地區，即表中的天寶（保）軍、平戎軍（城）、維州、柘州、悉州，其中天保軍、平戎城兩處，更是位於開元二十四年新置的恭州附近，不難想見，這與玄宗命首領董氏“納子爲質”的安排必然存在某種內在聯繫。

西山地區軍鎮體系強化後的實戰成效如何呢？董氏諸人在這一體系中有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文苑英華》卷六四八《兵部奏劍南節度使破西山賊露布一首》：

伏以南蠻亂德，恃險偷生，吐蕃舉國興兵，資其叛逆。頃者西山

戰士及八國子弟，因其窘逼，遂欲憑陵，敢懷猶鬥之心，來犯必誅之令。以正月五日，率故洪臘城裏囊邛三節度兵馬八萬餘人，分爲六道，攻圍萬安、柔遠、明威、平戎及保寧都護衛（疑衍）等五城。……萬安城使・金吾衛將軍張知海、柔遠城使・右金吾衛大將軍于仙障、平戎城使・武衛劉元果、明威副使・折沖管希光、攝保寧都護・折沖馬仙童等，久戍邊隅，備閑攻守。……八國招討副使・左羽林軍大將軍董當、左羽林軍將軍董旁郎、董畢郎、右羽林董利、董哥弄、左驍衛將軍董利峰、左武衛將軍董奉仇、左威衛翊府中郎將・先鋒党利才統八國子弟八千餘眾，並拜都護武士府健兒一千余眾，間道設伏，潛入深林，旗鼓相望，晝夜苦戰。……十八日，都知西山子弟兵馬副使・左金吾衛大將軍・攝臨翼郡（翼州）太守董郃麴、左羽林軍大將軍・兼靜□郡（靜州或羈州）太守董元智、右羽林大將軍・兼蓬山郡（柘州）太守董懷恩、右驍衛將軍・兼歸城郡（悉州）太守董思賢、江源郡（当州）太守董懿、右驍衛大將軍董仁罷、折衝董弄封等，領八郡驍勇並蕃漢武士等七千人，自蓬娑路取牙山，出其不意，銜枚夜襲。……同州（疑衍）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左羽林大將軍・兼通化郡（茂州）太守譚元受，遣左金吾衛將軍裴振、攝維川郡（維州）長史・折衝張粲、雲山守捉使・折衝姚高侃、攝天保郡（保州）・折衝楊夏日、攝司馬董元勒等，率健彍三千人，自滴博嶺入，競施掎角之勢，各陳擒縱之謀。

上引史料中的這次戰役堪稱節度使體制下西山諸軍攻防機制的一次集中展現，值得重點分析。首先我們來看唐軍一方的兵力構成。見於《露布》中的有以下三類：首先是“西山戰士”、“八國子弟”、“八郡驍勇”等，他們是羌人部落兵，由董氏諸羌酋率領，兵力在一萬人以上；其次是“健兒”、“健彍”等，他們是劍南道的募兵，以漢人爲主，由節度使麾下軍將統領，兵力在

數千人；再次是“蕃漢武士”，應屬於羌以外的其他部族兵與漢兵的混編軍種，人數較少。從以上分析來看，羌酋率領的部落兵顯然是本次戰役的主力[(40)]，唐軍之所以能反守為攻、“以少克眾”，羌人的戰鬥力無疑起到了關鍵作用。上述情形應該是節度使體制下西山攻防戰役的一種常態，對此，不妨稱之爲“羌漢協同作戰機制”，它最終確立於天寶年間，此後長期作為劍南道西山防禦中的基本策略，亦即杜甫所說的“藉其（羌）爲本，式遏雪嶺之西。”

“羌漢協同作戰機制”之所以能發揮效用，與對董氏羌酋的有效統馭分不開。上引《露布》中出現了多名董氏羌酋，他們大多帶有一長串的職銜，仔細分析大體有如下幾種：數量最多的是諸衛將軍，除董懿、董弄封、董元勒三人外其他都帶有此類官銜。我們知道，到天寶末期爲止，隨着府兵番上制度的廢止，諸衛將軍也多趨於閑冗，董氏等羌酋自然不用遠赴京城履職，這類官職應該是根據他們所統部眾的多寡而相應授予的榮譽性頭銜[(41)]；其次是西山諸郡太守（刺史），這類官職應該是其家族世襲職務，杜甫有言：“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據此他們應該是構成西山諸羌武裝力量的基幹；最後是節度使下的軍事使職，如董當任八國招討副使，董郃麴任都知西山子弟兵馬副使，這類官職人數最少，應該是處於大小羌酋之上的總領性職務。其中的“都知西山子弟兵馬副使”，應該是指揮西山諸羌部落兵的關鍵性軍職，由節度使直轄，這裡的董郃麴擔任的是副使，而正使一職，此時似乎也是由羌酋充任，這從後述乾元年間任西山子弟兵馬使的董嘉猷可以看出。

綜合以上分析來看，至遲到玄宗末期，董氏羌酋已逐漸融入王朝官僚體系，而其各自的部落也被納入藩鎮體系，成爲王朝邊疆防禦中的重要軍事力量。開元、天寶之際，唐軍得以逐漸扭轉高宗、武后以降的邊疆防禦頹勢，唐、蕃攻守之勢也隨之易位，這自然與西北、西南幾大軍區的陸續建立直接相關。就地區西南而言，“羌漢協同作戰機制”是西南防禦體系中的一大關

鍵，而羌酋董氏又是這一機制中的關鍵。

（3）安史之亂後的董氏

安史之亂爆發後，乘唐軍無力西顧之機，吐蕃在西南、西北邊境順勢佔領了大片領土，開元、天寶時期致力經營的西山防禦體系此時也一度趨於崩潰。以廣德元年爲界，“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42)隨着西山诸州的淪喪，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松、當、悉、靜、柘、恭、保、真、霸、乾、維、翼等爲行州，以部落首領世爲刺史、司馬。”(43)即將淪喪諸州僑置於唐朝境內，而部分羌人首領也陸續遷至其間，墓誌中的恭州刺史董嘉猷，從時代來看，所擔任的職務應該也是所謂行州刺史(44)。

除董嘉猷之外，在安史之亂後不久，史料中還能見到其他董姓羌酋的活動事蹟。前引杜甫《東西兩川說》：

> 頃三城失守，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此輩見闕兵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獨漢卒自屬裨將主之。……仍使兵羌各繫其部落，刺史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使八州都管，或在一羌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是羌之豪族，發源有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藩落之議於中，肆與奪之權於外，已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藉其爲本，式遏雪嶺之西哉？比恙俗封王者，初以拔城之功得，今城失矣，襲王如故，總統未已，奈諸董攘臂何？王尹之獄是矣。由策嗣羌王，關王氏舊親，西董族最高，怨望之勢然矣。誠於此時便宜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王，區分易制，然後都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益元戎氣壯，部落無語。(45)

杜甫這段文字在前文已有引用，其中所涉史事還有一些難以確考之處，但大

意應該是說，當時唐政府任命一位官方冊封的羌王統領諸部（“由策嗣羌王”），而據前引《舊唐書· 地理志》：“乾元元年二月，西山子弟兵馬使嗣歸誠王董嘉俊以西山管內天保郡歸附，乃爲保州，以嘉俊爲刺史。”可知這位“嗣羌王”應該是指嗣歸誠王董嘉俊[46]，他在天寶元年時已任靜戎（霸州）郡太守[47]，此後天寶十三年前後曾率軍參與對南詔的作戰[48]，乾元二年時又任保州刺史。同時以郡王之爵身兼西山子弟兵馬使，總領西山諸軍。但這有違諸羌部落間不相統屬的傳統，由此引發了其他部落尤其是族望最高的西董一支不滿。

董嘉俊之所以能夠取得超然於諸董的政治地位，是因爲朝廷所授官爵，由此可見這一家族與朝廷關係最爲密切。關於這一點還可以看出一些跡象，敦煌本《歷代法寶記》：

> （永泰二年）副元帥、黃門侍郎杜（鴻漸）相公初到成都府日，聞金和上不可思議，和上既化，合有承後弟子。……即於大衙日問諸軍將等：“知此管內有何名僧大德否？”節度副使牛望仙、李靈應、歸誠王董嘉會、張溫、陰洽、張余光、張軫、韋鸞、秦逖等咨相公（后略）。[49]

其中提到的歸誠王董嘉會，顯然是繼董嘉俊之後襲爵者，從制名來看，可以判定是近屬兄弟[50]。在永泰二年時，董嘉會的身份是府衙中的諸軍將之一，由此可見這一支董氏在西山陷落後已經遷居成都，成爲節度使麾下直轄軍將。類似例證還可以舉出董嘉榮，他與杜甫有過交往，今杜集中有《寄董卿嘉榮十韻》一首，其中提到董嘉榮曾率軍往西山“防秋”，這屬於季節性駐防，他本人應該與董嘉會類似，已常住成都，也正因此才能與杜甫相識。董嘉猷同樣如此，據《郭氏墓誌》中透露的信息來看，他應該在長安生活過很長一段時間，並憑藉資財與士大夫家族聯姻。總之，隨着遷離西山故土定居內地，羌酋董氏中的某些支系開始出現了漢化的跡象，這從董嘉俊等人的制名以及與漢人士大夫的交游、聯姻都可以看得出來。

當然，董姓羌酋遷離故土的時間並不一致，董嘉俊家族外，其他支系起碼在安史之亂後的一段時間內還是在故土活動，直到貞元年間韋皋鎮蜀時纔陸續內遷至唐朝境內。《舊唐書》卷一九七《東女國傳》：

> 貞元九年七月，其（東女國）王湯立悉與哥鄰國王董臥庭、白狗國王羅陀忽、逋租國王弟鄧吉知、南水國王侄薛尚悉曩、弱水國王董辟和、悉董國王湯息贊、清遠國王蘇唐磨、咄霸國王董藐蓬，各率其種落詣劍南西川內附。其哥鄰國等，皆散居山川。……西川節度使韋皋處其眾於維、霸、保等州，給以種糧耕牛，咸樂生業。立悉等數國王自來朝，召見於麟德殿。授立悉銀青光祿大夫、歸化州刺史；鄧吉知試太府少卿兼丹州長史；薛尚悉曩試少府少監兼霸州長史；董臥庭行至綿州卒，贈武德州刺史，命其子利羅爲保寧都督府長史，襲哥鄰王。……其年，西山松州生羌等二萬餘戶，相繼內附。其黏信部落主董夢蔥，龍諾部落主董辟忽，皆授試衛尉卿。立悉等並赴明年元會訖，錫以金帛，各遣還。尋詔加韋皋統押近界羌蠻及西山八國使。

由於西川節度使韋皋對西山地區的有效經營，安史之亂後一度役屬於吐蕃的西山八國此時紛紛內附，唐廷也以此爲契機設立了“押近界羌蠻及西山八國使”由節度使兼任，以負責對西山諸羌等的管理。貞元九年歸附的羌人中同樣有很多董姓首領，但從制名特徵來看，應該跟董嘉俊等人不是一個支系，他們屬於此前與唐接觸較少的“生羌”，姓名上還保留了原有的民族特徵。韋皋將他們安置在維、霸、保等州，這同樣是僑置在唐朝境內的“行州”，非復西山故地。

此後羌酋董氏應該長期定居在唐朝境內的保、霸等州，繼續作爲唐代西山防禦的軍事力量發揮作用，貞元十九年韋皋調遣諸軍進攻吐蕃維州城時有保、霸二州刺史董振及某州刺史董懷愕[51]，應該就是此前歸附被安置在保、霸等州的羌酋。貞元以後，董氏的活動便不見於文獻記載，直到宋初，

這就是被稱爲保、霸二州蠻的董绍重、董忠義等人[52]，他們世襲二州刺史，這應該是延續了唐後期的做法。

五　結語

本文以《董嘉猷妻郭氏墓誌》爲線索，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對唐代西山諸羌中的董姓羌酋家族做了若干考察，結論如下：

《董嘉猷妻郭氏墓誌》中被稱爲“西南蠻”的董氏一族，應該屬於西山諸羌中的一支，他們源自吐蕃轄下的西羌多彌部。唐宋文獻中之所以稱之爲“蠻”、“夷”，一方面是因爲唐後期“羌蠻混雜”的社會現實，另一方面也與西山地區所屬行政區劃的變動以及正史《四夷傳》的書寫機制存在複雜的聯動關係。對董氏族屬的個案考察，爲唐宋之際對羌人認知概念的轉變提供了一則頗具代表性的個案。

自唐初以來，董氏等西山羌酋一直依違於唐與吐蕃之間，一方面接受唐朝的官爵，世襲本州刺史，另一方面也“潛通吐蕃”。但自玄宗開元年間起，唐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強對西山諸羌的控禦，另外隨着節度使體制的建立，西山地區的軍鎮配置也趨於強化，在這一過程中，董氏等羌酋普遍被授予官職，逐漸進入王朝官僚體系，而其率領的部落兵也隨之被吸收進入藩鎮體系，成爲唐代西南邊疆防禦體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安史之亂爆發後，因西山地區的淪陷，董氏的部分成員開始離開西山定居成都等地，他們與漢人士大夫交游、通婚，呈現出漢化跡象。

附記：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基於石刻文獻的漢唐間地方社會研究”（13AZS006）成果之一，同時受華東師範大學“博士生學術新人獎”項目資助。

在撰寫過程中得到了川本芳昭教授、牟發松教授的悉心指導。初稿草成後，友人方圓、楊懿、張熊諸君也提供了若干寶貴意見。在此謹一併致謝！

註

（1）關於四川地區早期非漢族群的概況，參馬長壽《四川古代民族歷史考證》，收入《馬長壽民族學論文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

（2）六朝隋唐時期四川境內非漢民族的漢化及郡縣支配體系的建立過程，參松井秀一《唐代前半期の四川−律令制支配と豪族層との関係を中心として−》，《史学雑誌》71（9），1962年；佐竹靖彦《唐代四川地域社会の変貌とその特質》，收入《唐宋変革の地域的研究》，同朋舎，1990年；川本芳昭《民族問題を中心として見た五胡十六国南北朝階段における四川地域の状況について》、同作者《民族問題を中心として見た北朝後期における四川地域の状況について》，以上兩文均收入《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国家》，汲古書院，2015年。

（3）所謂“西山”，是唐人對成都府以西岷江上游群山的統稱，約當今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內汶川縣、茂縣、理縣、黑水縣等地。

（4）山口瑞鳳《白蘭とSum paのrLans》，《東洋学報》52(1)，1969年；同作者《東女国と白蘭—rLans氏とsBran氏—》，《東洋学報》54(3)，1971年。

（5）佐藤長《唐代の青海・チベットの民族状況》，《鷹陵史学》10，1985年。

（6）李紹明《關於羌族古代史的幾個問題》，《歷史研究》，1963年第5期；同作者《唐代西山諸羌考略》，《四川大學學報》，1980年第1期。

（7）郭聲波《唐代弱水西山羈縻部族探考》，《中國藏學》，2003年第2期；同作者《川西北羌族探源—唐宋岷江西山羈縻州部族研究》，《中南民族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郭氏另對西山地區的政區建制做過一系列考辨，詳下注。

（8）此類論著爲數甚夥，難以盡述，舉其要者如：馬長壽《氐與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冉光榮、李紹明、周錫銀《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

（9）《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二《劍南道中》“恭州”條，中華書局，1983年， 第819頁。

(10)關於西山地區的政區建制，參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25-995頁；郭聲波《“岷江西山九州”考—唐貞觀十三年政區考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2期；《唐弱水西山羈縻州及保寧都護府考》，《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4期；《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唐代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960-988、1276-1299頁。按，西山諸州中有不少曾一度升爲正州，但

例以羌酋世襲刺史、令長，因此終究屬於羈縻性質。

(11)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二五，中華書局，1979年，第2211頁；又見《全唐文》卷三六〇，文句微有差異。

(12)石泰安著、耿昇譯《漢藏走廊古部族》，中國藏學出版社，2013年，第46-68頁；周偉洲《多彌史鉤沉》，《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

(13)王堯、陳踐《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94、145頁。

(14)前揭《白蘭とSum paのrLans》;《東女国と白蘭—rLans氏とsBran氏—》。

(15)冉光榮等《羌族史》，第210-213頁。

(16)關於這一點，嚴耕望先生曾列舉出唐以前的若干例證，見《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第925-927頁；另參唐長孺先生《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道交通》，收入《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1983年。

(17)“西董”（sDong）可能與《舊唐書·東女國傳》中出現的“悉董國”、“西悉董王”也存在某種關聯。這一點不能確證，附識於此，以俟高明指教。

(18)《舊唐書》卷一九七《東女國傳》，第5277頁。

(19)蒙默《試論漢代西南民族中的“夷”與“羌”》，《歷史研究》，1985年第1期；魯西奇《釋“蠻”》，《文史》，2008年第3輯。

(20)林超民《<西洱河風土記>及其史料價值》，《雲南社會科學》，1982年第3期。

(21)《舊唐書》卷四一《地理志》成都府條：“旧（貞觀年間）領縣十六，戶十一万七千八百八十九，口七十四万三百一十二。”（第1664頁）

(22)參趙心愚《唐“松外蠻”考》，《西北民族論叢》第六輯。

(23)參前揭周偉洲《多彌史鉤沉》。

(24)饒宗頤《西南文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集刊研究所》第46本第1分，1974年；關於“端公”的民族志資料，參《中國各民族原始宗教資料集成·羌族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488-495頁。

(25)董嘉俊見前引《舊唐書》卷四一《地理志》保州條，董嘉會、董嘉榮詳見下文。

(26)《全唐文》卷六九〇《上巳日陪劉尚書宴集北池序》，中華書局，1983年，第7066頁。

(27)《太平寰宇記》卷七七《劍南西道六》雅州條，中華書局，2007年，第1551-1552頁。

(28)　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第183頁。

(29)《唐會要》卷六三《史館·諸司應送史館事例》：“(前略）蕃夷入寇及來降。（原注）表狀，中書錄狀報。露布，兵部錄報。軍還日，軍將俱錄陷破城堡，殺傷吏人，略擄畜產，并報。……已上事，并依本條，所由有事即勘報史館，修入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85-1286頁。

(30)《舊唐書》卷四一《地理志》“霸州”條末：“(松、文、扶、龍、當、悉、靜、

恭、柘、保、真、霸）已上十二州舊屬隴右道。永徽已後，割屬松州都督府，入劍南道。諸州隸松州都督，相繼屬劍南也。”（第1706頁）。另參嚴耕望《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收入《嚴耕望史學論文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35-636頁；郭聲波《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唐代卷》，第973頁。

(31)管見所及，指代劍南道岷江上游地區的“西山”一詞似始見於陳子昂《諫雅州討生羌書》（《陳子昂集（修訂本）》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22頁），時在武后年間。

(32)參《宋會要輯稿·蕃夷五·西南蕃》；《宋史》卷四九六《蠻夷傳》；《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九“景德二年正月”條并李燾注。

(33)《舊唐書》卷一九六上《吐蕃傳》，第5237頁。

(34)佐竹靖彦《唐代四川地域社会の変貌とその特質》，收入《唐宋変革の地域的研究》，同朋舍，1990年。

(35)村井恭子《押蕃使の設置について—唐玄宗期における対異民族政策の転換—》，《東洋学報》84（4），2003年。

(36)對這一摩崖題記的分析，詳參李紹明《四川理縣隋唐二石刻題記新證》，《思想戰線》，1980年第3期。

(37)《張九齡集校注》卷一〇，中華書局，2008年，第591頁。

(38)日野開三郎《唐府兵制時代における団結兵の称呼とその普及地域》，收入《日野開三郎東洋史論集》第一卷《唐代藩鎮の支配体制》，三一書房，1980年。

(39)如松、當防禦使當置於一處，原表分列，今合爲一項；原表所列蓬州實爲柘州（蓬山郡）之訛，今刪去；原表有天寶元年兵馬數一項，今從略。除日野氏表中所據文獻外，《新唐書·地理志》、同書《兵志》、《元和郡縣圖志》等文獻還記有若干小型城、鎮、守捉，其設置年代不能一一詳考，有不少應是唐後期所置，今不計入。關於諸種文獻的比勘與校訂，詳參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中華書局，2011年，第75-80頁；清木場東《唐天宝初期の辺軍資料（二）—通典・図志及び旧志・通鑑—》，《産業経済研究》31（3），1990年；《唐天宝初期の辺軍資料（五）—軍鎮の地理記述—》，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の都市と農村》，汲古書院，1992年。經學者考訂，文獻中的記載雖還是存在若干歧異之處，但可以肯定的是《唐六典》所記爲開元年間的軍鎮情況，而《舊唐書·地理志》、《新唐書·兵志》、《通典·州郡典》、《資治通鑒》等文獻反映的則爲天寶或稍後時代的情況。

(40)上引杜甫《東西兩川說》：“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兼羌堪戰子弟向二萬人。”時在安史之亂後不久，反映的羌、漢兵比例大體與此相近，也可證羌兵確實是西山軍防的主力。

(41)《舊唐書》卷一九七《東女國傳》敘貞元九年西山八國自吐蕃歸順事：“舊皆分隸邊郡，祖、父例授將軍、中郎、果毅等官，……至是悉與之同盟，相率獻款，兼齎天寶中國家所賜官誥共三十九通以進。”（第5279頁）正可與《露布》所見董

氏職銜相印證。

(42)《資治通鑒》卷二二三廣德元年十二月條，第7158-7159頁。

(43)《新唐書》卷四二《地理志》松州條，第1086頁。

(44)《舊唐書》卷一九六下《吐蕃傳》:“(大曆) 五年五月，徙置當、悉、拓 (柘)、靜、恭五州於山陵要害之地，以備吐蕃。”(第5243-5244頁) 是知恭州僑置於大曆五年，而墓誌鐫刻於貞元二十年，此時董嘉猷已“歸葬一紀”，據此上推，則其卒於貞元八年前後，此時恭州舊土久已爲吐蕃所佔。

(45)《杜詩詳注》，第2210-2212頁。

(46)“由策”一句，語意晦澀，《全唐文》卷三六〇作“田策嗣羌王”，若如此，則田策爲嗣羌王之名，文中反映的是田氏與董氏的矛盾。但田姓羌酋不見於其他文獻，今暫從文集本。另參《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 第6485頁所列諸說。

(47)《太平寰宇記》卷八〇《劍南道》霸州條：“唐天寶元年因招附生羌置靜戎郡，便以羌附酋董嘉俊爲刺史，領七部族把蕃卓，子孫相繩不絕。”

(48)《唐故左步軍使兼左八營使特進試太常卿劉府君墓志銘并序》:“天寶中，南蠻犯邊，皇帝赫怒，命歸誠王問罪夷落，公時偕行，稍展其志……十三年，與留後李宓大破雲南，參以前揭其他記載，應該就是董嘉俊。此條史料承張熊先生提示，特此致謝。”(《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第425頁) 此處的歸誠王，參以前揭其他記載，應該就是董嘉俊。此條史料承張熊先生提示，特此致謝。

(49)《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1冊，第187-188頁。按，敦煌出土了多種《歷代法寶記》寫本，《大正藏》係據其中P.2125、S.516校錄，其他諸本的著錄情況詳參榮新江《敦煌本禪宗燈史殘卷拾遺》、《有關敦煌本<歷代法寶記>的新資料—積翠軒文庫舊藏“略出本”校錄》，均收入氏著《辨偽與存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50)最早注意到這條材料的似爲陶敏《<歷代法寶記>、杜詩及其他》一文，收入《唐代文學與文獻論集》，中華書局，2010年。

(51)《舊唐書》卷一九六下《吐蕃傳》，第5260頁。

(52)關於董氏在宋代的活動，參《宋史》卷四九六《蠻夷傳》;《宋會要輯稿·蕃夷五·西南蕃》。